



《恒顺故事》选登

新纪元公私合营

滕建锋



“四月二十三哪，日子真难忘啊，百万的大军，渡呀渡长江啊……”这首《镇江解放之歌》传唱至今，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的歌声在镇江上空久久回响。1949年4月23日，大军南渡，镇江解放。

然而，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层层盘剥之下，恒顺的生产经营面临重重困难：资金匮乏，生产不足，加之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产品早已停产，存货很少，产品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销售。新生的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恒顺的生存发展，1949年5月向恒顺发放生产性贷款，贷款额度一般占进货额的85%，且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向恒顺分配黄豆、面粉等计划原料。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让恒顺很快摆脱了困境，走向新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迈开了步伐，“三大改造”的完成让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镇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正是从恒顺开始的。

1954年12月，镇江市委工业部、统战部通过调查摸底，拟定了《关于恒顺酱醋厂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作方案》，认为恒顺“产品历史悠久，为本市酱醋业中最大一家，共有职工62人，其中党员2名，团员7名，有一定的组织基础，产品为人民群众需要，且部分产品已被合作社订货收购。恒顺的主要生产原料糯米、大豆、面粉、原盐均由国家控制分配，并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因而提出“国家投入少量的资金和干部，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的资金、干部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企业”。

1955年3月，镇江市委向恒顺派驻工作组，组长由市总工会宣传部长汪柏森担任。同年5月，成立恒顺党支部，同时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劳方6人、资方1人组成，该委员会主要负责领导生产，研究制订生产和财务计划，决定企业的重大问题并向党委报告。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李友芳等资方代表消除了顾虑，主动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

1955年10月，镇江市委批准成立公私合营恒顺酱醋厂筹备委员会，清产核资。同年12月20日，市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调查核实，认为恒顺合营条件完全成熟，随后召开恒顺职工大会，宣布市委批准关于正式成立公私合营镇江恒顺酱醋厂，归口工业局领导。恒顺成为镇江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厂从此更衣换帽，在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发展的新纪元。

公私合营后，恒顺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机制和规章制度，同时积极培养工人干部，职工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1956年，恒顺生产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233900元，其中香醋业绩增长达62.45%，当年产品销售地区新增青海、陕西、广西等地，销售范围已达18个省、市、自治区，并且恢复了产品出口业务。1956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酱醋调味品会议上，恒顺香醋被评为固体发酵质量第一，成为全国名产品。

1958年是镇江市区酱醋行业变革之年。据统计，当年镇江酱醋生产企业（包括小作坊）共有48家。恒顺厂公私合营后归口工业局，而其他47家于1956年进行对私改造后归口蔬菜公司。这48家酱醋生产企业在生产原料供应、产品规格、质量及其营销业务渠道和价格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直接影响到酱醋业的生存与发展。1958年7月，镇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全市所有酱醋行业的制造车间归并于恒顺厂，由工业局领导。

1958年的大合并，为镇江酱醋业创造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一是生产技术力量增强，合并把各家的技术之长汇集到一起，形成了技术优势，对发展生产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二是生产集中管理，产品的规格质量统一、标识统一、价格统一，避免了行业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的现象，有利于从市场需求出发安排生产。三是人力、物力能够合理安排，充分使用。当年10月1日，为解决销售业务上仍然存在的协调问题，镇江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将生产与销售合并于恒顺厂，统一归口商业局领导。这样一来，产销关系全部理顺，全行业真正意义上拧成了一股绳，做到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操作规程、统一规格质量、统一批零价格，形成规模产销格局。1959年，恒顺酱醋年产量达1241吨，历史上首次突破千吨大关。

“京镇”略述

乔长富

“京镇”这个名称，是六朝时期与“京”和“京口”有着密切联系而又独具含义的一个历史名词，也是中国六朝时期除了古代镇江以外未见别处有过的一个独特的称号。对于它，今存有关古代镇江的方志和史书未见正面的解释，令人难得述及也并不恰当。所以有必要探其究竟，以作出正确的解读。

“京镇”的含义

“京镇”这个名称，虽是与六朝时期的“京”和“京口”有密切联系，但在《三国志》《宋书》等史书中未见有“京镇”这个词。从史籍看，最早当是唐代许嵩在《建康实录》“太祖权上”里提到了它。该书说：建安十三年（208），“权始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案《地志》：吴大帝亲自自迁朱方，镇京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即今润州城也。因京岷立名，号为‘京镇’。”今天看来，这段话中也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例如作者把孙权迁“京”说成迁“京口”，说“京镇”是“因京岷立名”，都不恰当。但该书在今存史籍中首次述及“京镇”，并说它“号为京镇”，显示“京镇”是一个称号，因而有重要价值。再从诗歌看，唐代储光羲《临江亭五咏》其一：“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其诗序说：“建业为都旧矣，晋主来此，而物物尽备，虽云在德，亦云在险。京口其地也。”而“临江亭”在京口。由此诗可见，所谓“京镇”，是指地区，东晋以来是指“京口”一带地区。

那么，“京口”这一带地区为什么又称为“京镇”呢？对此，未见前人有正面解释。但在《嘉定镇志》卷一“转引《太平寰宇记》”所录《南徐州记》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说：“京口先为徐陵，其地盖丹徒县西乡之京口里也。权都秣陵，置京都督以镇。”由“京都督以镇”可见，“京”是地名，“京都督”是镇

守“京”地的都督，那么“京镇”当是指驻军名号及其所镇守的地区。至于这一地区，在东吴时期当是在“京”地一带（“京”称“京口”当始于西晋时期）。

“京镇”镇守地区和“京都督”权力的扩大

“京镇”的设置，从上引《南徐州记》说“权都秣陵，置京都督以镇”以及《嘉定镇志》引《太平寰宇记》说“建安十六年，迁都秣陵，复于京口置京都督以镇焉”可以看出，京镇的设置是肇始于建安十六年孙权自“京口”（当作“京”）迁居秣陵之后。而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宝鼎三年（268）“芍坡之役，（顾承）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顾承传》）：“（孙）越兄楷武卫大将军、临沂侯，代越为京下督”（《宗室传》）；天玺元年（276）“京下督孙楷降晋”；天纪三年（279）“（孙）皓又遣徐陵督陶潜……”（《三嗣主传》）。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京镇”的长官由将军担任，先是为“京下督”，大约在天玺元年京下督孙楷降晋后不久，“京”改称“徐陵”，“京下督”也改称“徐陵督”。由“京下督”“徐陵督”可以看出，“京镇”在东吴时期所镇守的地区，主要是在“京”“徐陵”一带。

西晋灭吴以后，“京”或“徐陵”远离首都，属毗陵郡（治地丹徒），其重要地位相对削弱，因而不见有“京都督”及“京镇”的称号。到了东晋时期，首都在建邺（今南京）。“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就反映了这一变化。从《嘉定镇志》所录“晋（东晋）徐州刺史”看，东晋时期镇守京口的长官，大多带“将军”有时还有都督头衔，有的还有“镇京口”的记载，而且他们所镇守的地区，也比“京”或“京口”地区要大得多，其权力显然比东吴时期的“京都督”要大得多。例如，所载蔡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假节”。由



此可见一斑。宋齐梁陈时期，治地在京口的南徐州刺史，往往也带有将军、都督的头衔，其地位和所辖地区有的还大于东晋。例如，刘宋南徐州刺史刘义康就曾以“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可见其辖地之广，权力之大。这种情况，直到隋朝统一以后，罢镇置州、罢州为县，“京镇”也在事实上不再存在，从而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京镇”存在的这段历史今天的镇江人还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京镇”与“京”“京城”“京口”的联系与区别

题目所举的这四个词，“京城”“京口”“京镇”都是因“京”得名。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京”是地名，“京城”是建于“京”地之上，是“京镇”治署所在。“京口”与“京”，从自然地理说，有联系又有区别（详下），但从“京镇”所镇守的地区说，东吴的“京”实际也包括后来称为“京口”的地区在内，西晋以来的“京口”实际又包括历史上的“京”地在内。这一点，从有关史籍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里不拟详述。尽管如此，这四个词，得名时间有先有后，所指地域有大有小，还是有重要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得名时间说，“京”的得名时间，从《三国志》多次提到“京”地看，当不晚于东汉。“京城”的得名时间，从《三国

志》“孙韶传”附“孙河传”说孙河“后为将军屯京城”，而注引《吴书》说孙河在建安六年（201）打败袁术后拜威冠中郎将看，建安六年当已建有京城，其得名时间当在建安六年不久。“京镇”的设置时间，从前引《南徐州记》可见，是在建安十六年孙权自“京”迁往秣陵以后。但“京镇”这个名称，在今存《三国志》等南朝史籍中未见有正面叙及，直到唐代才如前文所说，出现了“京镇”这一称号。至于“京口”这一名称，从《三国志》只称“京”而不称“京口”，而《宋书》“武帝本纪”说刘裕的先辈西晋末年过江居丹徒县西乡“京口里”看，其得名时间当在西晋时期。由上可见，“京”“京城”“京镇”“京口”的得名时间有先有后，并不相同。

其二，从所指地域说，“京”本来是指从北固山到京岷山之间的这一大片丘陵高地。“京城”是指建造于土山（今北固山前峰）之上的城垣，其所占地域只有土山之上及其附近地区。“京口”本来是指“京”地之下的濒水地区，在西晋成为“京口里”后，它所拥有的地域，当是东起京岷山一带，西至蒜山一带，南至南山一带，北至北固山沿江一带。而“京镇”所管辖的地区，在东吴时期，主要是“京”地或徐陵一带；在东晋时期则扩展为以京口为治地的南徐州一带，所辖地区远远超过了“京”和“京口”。

了解到上述情况，你还会认同“京镇”与“京”“京城”“京口”是一回事的说法吗？

流芳他乡的桑梓嘉宦顾方

孟宪成

顾方，字正夫，丹阳人。北宋皇祐五年（1053）登进士，嘉祐三年（1058）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象山令。据《象山志》记载，顾方是象山立县之后的第35任县令，也是第一位“进士县令”。不过顾方于嘉祐四年（1059）便因“背痛”卒于任上，他去世后，象山百姓悲痛万分，官方也为他立祠塑像，900余年四时祭饷不绝，可谓流芳百世。

北宋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里，记录了顾方的事迹：顾方到任象山后，首先召集邑中父老，询问民间疾苦，了解士民中的善恶之人。对于善者，他亲自登门拜访，鼓励其保持善心；对于恶者，则劝其改弦更张，痛改前非。顾方还大兴学校，建造校舍，让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得以入学受教，有空暇的时候他还亲自授课。到了第二年，象山县的民众素质和社会风尚都

焕然一新，但顾方却得了重病，成百上千的县民到塔庙为他祈祷，且甘愿为他“割股以疗”的百姓就有13人之多。

《明州象山顾县令祠堂碑记》（下称《碑记》）除了有相同记载外，还有一些记述可资补充：顾方到任后平反冤案，抚恤穷人，诉讼断案也能做到公正廉明，具有廉洁谦让的风格……顾方病情加剧，生命垂危时，有一个名叫陈佑的百姓，毅然割下腿肉，供奉到神灵前，虔诚地哀求：“救救我们的县令吧”。

顾方任职象山令仅仅两年，何以受民爱戴如此。象山地方志书《象山县西谷记》里的说法可窥缘由：象山县境三面环海，自古县治以兵事为重，历代县令都采取武力粗暴的方式统治县民，压根不考虑教育民生的问题，所以“（县）令有顾方者始有治迹”。另据《碑记》记载：象山水陆

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办事人员敷衍塞责，政令到达往往需要一年半载，衙内文书档案凌乱不堪，给贫官狡吏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盗匪猖獗，百姓深受其苦。这时来了一个爱民如子，整顿吏治的“进士县令”，怎么能不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呢？

顾方的政绩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四库全书》《象山志·名宦传》《江苏省通志稿·人物传记》都对其予以载录。嘉祐六年（1061），顾方去世两年后，由官方出面为他建祠，顾方的丹阳同乡钱君倚和常州文人胡完夫都记事刻石于祠中，其他同僚、文士作诗文称颂者不可胜数。该祠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重建，称“顾公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尚存。不过因为顾方的职位较低，不能在官修正史中得以列传，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还抱憾不平。

任职他乡的顾方去世后，他的子孙并

没有回归故土，长子顾直率家人在象山县五狮山南麓的龙峰（现名山根）开村立户；次子顾宽则在慈溪（今浙江余姚）长亭顾家埠定居。千年以来，山根顾氏始终秉承耕读传家的族风，在《顾氏宗谱》的开首篇，即是顾方始书：“……余自登进士得尹（治）象山令，皆先德之留贖，以故公暇之余，即读书于退堂之居室，亦不忘先代读书家法，且以启后人……”顾氏后人历朝历代不乏人才辈出，民国时曾出了两位北大毕业生，包括被称为“浙东公费留学日本第一人”的顾福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因高考录取人数多，山根村被誉为“状元村”。顾方若泉下有知，也当含笑欣慰的。

不过这样一位留芳他乡的桑梓嘉宦，查阅《镇江市志》《丹阳市志》，却未见刊录，不免令人为之抱憾。

闲话冬至

刘昌宇



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在我国古代，有“冬至大如年”之说，由此可见古人对冬至的重视。

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直至明清。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贺，欢愉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

既然把冬至当成一个节，自然少不了美味佳肴的陪伴。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

而在江南水乡，在冬至之夜还有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相传，共工氏有不才子，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

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沿袭至今，成为南北各方普遍认可的饮食习俗，莫过于在冬至这天吃饺子了。谚云：“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这种习俗，是因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据传东汉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后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或“扁食”。

为了欢度冬至，古人还以填九九消寒图的方式，赋予了这一传统节日美好的意蕴。九九消寒图通常是一幅双钩描红书法，上有繁体的“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每字九划，共八十一划，从冬至开始每天按照笔画顺序填充一个笔画，每过一笔画充好一个字，直到九九之后春回大地，一幅九九消寒图才算大功告成。

如今，冬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节气而被人提及，而节日的功能则已式微，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申遗成功，说明我们的民俗文化正日益得到发扬光大。